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一位北京“洋造反派”的文革50年反思	莫 雨·任禹阳
【档案解密】	对一份后文革年代资料的多重解读 （二）	张 比·孙 耘·唐少杰
【史海钩沉】	在文革五十周年反思研讨会上的两次发言	郑 义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一位北京“洋造反派”的文革50年反思
——李敦白文革爆发50年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 莫 雨·任禹阳 •

受访者：李敦白
地点：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或许对李敦白这个名字有所耳闻。他当时是积极支持文革、参与“造反”的在华外国专家之一，在北京城红极一时。但他自己后来也在文革中成为被打倒的对象，入狱10年，罪名是美国特务。文革结束后，李敦白携中国妻子以及四个孩子移居美国。如今距离文革爆发过去了50年，这位95高龄的文革亲历者对美国之音讲述了他的文革经历与反思。

1966年10月1日，一名美国人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人民日报》之后在头版刊登了他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中，毛泽东正在给他的“红宝书”签名。

这名美国人叫李敦白，英文名Sidney Rittenberg，1921年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个犹太裔名门望族，早年曾加入美国共产党，参加工会和民权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学了中文，被派往中国昆明。战争结束后，李敦白选择留在中国，到了毛泽东领导的延安，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他被苏联当局指控为“国际间谍网络”的成员而被中共逮捕入狱，1955年斯大林死后，获释出狱。他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担任外籍专家，为英文稿件润色，并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

◇ 革命热情

当1966年他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如狂风骤雨般席卷全国。

50年后，李敦白在他在亚利桑那州的家中对美国之音说，当他听到那些充满“革命热情”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讲话，当他看到个人的意见可以自由表达，他“很兴奋”，并且认为，自己参与文革，即便“最后可能弄得一身泥”，也很值得。

说到这里李敦白笑了起来。他用流利的中文说：“当时我是最积极的支持。是啊。……因为我觉得真的，他们会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学校，都是学生讨论、多数通过去执行，这个以前都没有。我认为中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国家。”

李敦白说，他当时只注意到毛泽东的所谓的“大民主”，并没有意识到毛泽东的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李敦白说：“那个所谓大民主，都是胡闹，都是利用它来消灭毛泽东认为的敌人。”

“当时的青年，他们知道什么叫民主吗？”记者问道。

他说：“糊涂蛋，根本不知道。不要说他们，连49（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的青年，都懂得民主是多数说了算，很少懂得少数派是要保护的，少数人要让他发言。一般谁在广场当天做领导，都不让对立面的人发言，一发言就轰他。那么真正的民主，你不能保护反对派、少数派的权利，这个民主很快就会变成霸权，会变成专政。现在说得挺通了，当年不懂。真的。我是挨了打，受了教训，想了（才懂）。 ”

◇ 造反夺权

李敦白积极投身于这场他所认为的“民主革命”。他加入由外国专家组成的造反派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参加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造反夺权”，后被中央文革小组任命为“三人小组”的主任。一位美国人，成为中国重要宣传机构的一把手。

李敦白说，他实际上把实权交给了组内另一名成员康树集，自己担任顾问，所以只是名义上的负责人，但是他后悔没有彻底请辞主任一职。

他说：“后来我发现了，有些党员干部，他脑子里想的，跟我想的并不一样。他想的不是主要的想理想，主要想的是权，想他的地位，他的权。”

“你想过要权吗？”记者紧接着问道。

李敦白：“我没有。我对权没兴趣。但是尽管这样说，我有权倒不怎么样，但名，我有大名，全国的大名……。是这个东西很迷醉人。”

◇ 句句真理

成为名人的李敦白受邀四处演讲，走在路上也会被人认出索要签名，他也经常作为外国专家代表在批斗会上发言。他说，自己参加过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以及广播局局长梅益等人的批斗会。

1967年4月10日，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的“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上发言。

对于这个批斗会，李敦白说：“那时候批王光美的，在清华，江青是要我去的，周总理直接讲了，最好你不要去，但我听了江青的，不听周恩来的。这是错误的。”

当被问及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信念时，李敦白答道：“傻啊。真的。就是把批判的功能完全放弃。把批判放给党。……我有一个想法，因为我是从美国来的，是从一个挺舒服的中产阶级家里来的，这个美帝国主义那时候算中国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接受了我，把我当同志，我要特别小心，不能成为一个弱点，不能因为我是美国人，就害了他们，成为弱点，所以就很容易过左。所谓宁左勿右。”

他说：“一种思想意识，不敢批判得看它，一个本来比较温柔，好心的人，可以做非常可怕的事儿。因为他把自己的心就变硬了。他觉得这是为了什么伟大目标来做的，什么都不管。”

◇ 暴烈行动

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红卫兵和造反派以“破四旧”和“打倒阶级敌人”为名砸毁古物，批斗迫害被视为“剥削阶级”和“反动派”的人，而各个派系之间也陷入争斗。文革很快变成了一场充斥着暴力与混乱的疯狂运动。

记者问：“看到 torture（酷刑折磨）的场面，你有怀疑过文革是民主吗？”

李敦白说：“没有。我应该怀疑，但是我没有。……我觉得这是过激的行动，但还是革命的行动。”

记者问：“都有哪一些批斗打人的行为？”

他说：“打人我好像没看过。打梅益我看过。打一下。这个喷气式我看过，多了，那也是酷刑，很疼的。脑子是空的嘛。你认为有这种革命行动，历史才能进展。”

他说：“我们局里，我们局长梅益，我们有些技术部门的年轻人，梅益在外边在院子里做劳动。这些小家伙有些人来了就打。我们那个支部书记，那个时候是年轻的，他参加文革很积极，但是他劝这些年轻人，这些不对，是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走了以后，我就批评了他，我就说，群众有这种革命精神，你给他们泼冷水，会伤害他们。实际上是支持了。”

为什么支持？他答道：“因为毛主席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么温良恭俭让。所以我觉得，我要是不支持，我就是不革命。这是错的。”

那个疯狂的年代渐渐远去，但是李敦白说，这些事情成为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痛。

他说：“我参加了斗争，这么多好人，不但是文革，就是反右派的时候，什么这个肃反，每一次运动，我都参加了。那时候说了人，好人，这个是很痛的事。实际上，心痛的就是这一件事，别的，我糊涂办糊涂事，那我就糊涂，那怎么办？我觉得我不是觉得有罪，但这个事我觉得做得有罪。”

◇ 二度入狱

政治风云变幻，斗争对象很快就指向了那些“捧场”文革的外国人，树大招风的李敦白自然成为重要目标。在广播局身居要职大约6个月之后，李敦白的人生从云端跌落谷底。后来批判他的大字报说他“爬得高摔得狠”，“一个美国人如何夺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红色政权”。

李敦白说，他的好友、也是外国专家的马海德（George Hatem）曾经劝他不要参与文革，但是他没有听劝。

他说：“他说，不要卷入中国的政治，没好处。我说，你保守。还有德国人汉斯·米勒（Hans Müller）大夫，他们不参加，他们劝我。要听他们就好了。”

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小组宣布解散“三人小组”，成立新的领导班子，李敦白得到的通知是调离广播局，“有特殊使命”。当年圣诞节那天，他被软禁。第二年2月21日晚上11点半，他从家中被带走，关押于秦城监狱。罪名是美国特务。

这是他第二次被控间谍罪而坐牢。第一次被单独监禁6年零三个月，这一次则是10年。他的家人也受到牵连，吃尽苦头。

◇ 谁人之过

李敦白说，他是在出狱以后才逐渐认识到文革是怎样的一场灾难。

他说：“我一直坐了10年牢，出来以后我还不知道是怎样一个灾难。我刚回来，一些老朋友，都是老干部，刚解放出来。他们说，你不要着急，一定会平反。比如他骂康生，（我就说，）康生是中央领导，怎么骂他？我小儿子那时12岁，说爸爸说话怎么跟‘四人帮’一样？（笑）我什么都不知道。”

李敦白接着说：“两三年以后，我才悟到了，不但是文革是错误的，这整个无产阶级专政，这整套理论，根本就不对。你本来说通过专政可以达到最高级的民主，实际上，你通过专政，你就得更多的专政。你推翻专政，你才能有民主。慢慢儿理解了，就觉得很舒服。……你原来有幻想嘛，你解除幻想，就觉得应该轻松了。”

他说：“根本问题是领导错了。领导是让他们造成灾难，不管。领导是不管。发动他们，不允许反对他们。毛泽东有一个根本口号，文化革命，不破不立。不破不立，破在当头，立在其中。所以人家说，不行，乱了。他说，唉，我希望乱，乱到头就好了。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你不要担心，你就砸烂，旧的一套都砸烂，这个就会带来新的建设，但是没有。烂了还是烂了。”

我觉得毛泽东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天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阴谋家。……我觉得毛泽东根本的问题，也可以说根本的罪恶，在于他狂。他认为他有权发动这些庞大的运动，他改变了影响了几亿人的生活，但他自己都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当被问及文革是个人的错误还是制度问题时，李敦白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份儿嘛，他们都有他们的份儿，我有我的份。根本的错误，应该说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那些起主导作

用的人。……这个东西，定罪，我觉得也是作用也不大，你定了罪又怎么样？事实发生了，就是那样的。为什么发生，这倒是要仔细研究。为什么会那样，根本的问题，没有民主思想，完全没有民主思想。你让一帮群众自己选领导，那真是民主吗？如果不让别人说话，那真是民主吗？还是个集体的专政？”

他说，虽然文革是一场灾难，对中国人民代价巨大，但是“没有文革和文革的失败，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

◇ 返回故国

1980年，李敦白和中国妻子王玉琳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离开中国。李敦白说，他回美国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国出现的腐败现象感到反感。

回到美国几年之后，这位毛泽东所称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也和资本主义做了和解。他和妻子为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提供咨询，直到现在。

李敦白说：“后来回到美国，我发现跟我想的不一样，这些大公司首脑、资本家，他是最忙的人，而且他是很有才的人，否则他做不到。而且有的是很有道德的人，是很讲道理的人，这个跟我原来在美国的时候想的就不一样。”

谈到自己曾经的共产主义信仰，李敦白表示，他仍然相信未来会有一个没有阶级、战争和歧视的社会。

如今，95岁的李敦白和妻子王玉琳生活在凤凰城和西雅图两地。他说，他从1945年到中国的时候就希望在美中两国之间架桥，这种愿望，即便如今身在美国，仍旧未变，只不过是桥的另一边做些贡献。这位曾经的中共党员笑言，《人民日报》仍是他每日必读的报刊之一。

◇ 民主慢来

谈到当下的中国，李敦白说，习近平想要进行经济改革，但是改革面临阻力，如果要打开这个局面，则需要开放民主。

他说：“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党领导一切，和一个开放的市场，不行。不可能的。所以就要看有没有决心来搞经济改革。如果真有大决心的话，它得停止这一套压制人的。”

李敦白认为，中国能够慢慢地实现民主。他说：“我觉得像中国这么一个国家，要真正的民主，得一步一步来，首先大家得懂得什么叫民主，怎么样来民主管理，就刚才说的，不能就是多数人说了算，你也得照顾少数人。但是可以做的，我觉得，一步一步做。”

他接着也说道：“但是问题，如果威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不会允许的。所以我知道薄熙来是不会长久。香港是个悲剧。香港要求中央给他们更多的权，自治，你要不闹的话，我可能还信任你，愿意给你多点权，你一闹，他们要独立，那更厉害要压它。那你要告诉年轻人不要争取，那也不容易。中国不会允许香港有自由，怎么可能？只要有政权，它不可能的。这不是见了自由女像就掉眼泪的，不是那样的人。他是权，管权的。”

不过他说，他希望习近平能够进行政治改革。

“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像蒋经国那样以独裁结束独裁吗？”记者问。

他说：“最后可能有类似的东西，我觉得。不会很快。”

回顾自己在中国的35年传奇而坎坷的人生，李敦白说，他没有怨恨，即使是入狱16年。他说，看到中国前进发展，他为自己能够在其中起到一个“微小的作用”感到高兴。

□ 原载：《美国之音》

~~~~~

## 【档案解密】

### 对一份后文革年代资料的多重解读（二）

· 张 比 · 孙 耘 · 唐少杰 ·

（续 z k 1 6 0 7 b）

#### 二、后文革史之一粟：对一份文档资料的解读 —— 孙耘

手上有一份文档资料的复印本（下称“文档”），标题为：清华大学“文革”期间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产生和演变（未定稿），系用旧式中文打字机打印，而后标注的“（未定稿）”为手写。另附四张手绘表格：附件一：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组织机构设置表；附件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组织机构主要人员情况表；附件三：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组织机构设置表；附件四：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组织机构主要人员情况表。

此文档没有落款和日期。从字里行间看，这是一份调查报告的初稿（即“未定稿”），对清华文革中陆续出现的各个群众组织名称和成立日期，以及最后两大派的组织机构、主要成员等罗列得详尽准确。显然，没有清华大学提供基础档案资料就不可能成文，更有可能，清华有关部门直接派员参与了写作。

文档内容重点在附件中的“主要人员情况表”，列出了两派“记录在案”人员的名单，共计84人。“记录在案”工作是“清理三种人”运动的一环。“清理三种人”历时4年余，自1982年下半年开始，1983—84年为高潮，1985—87年陆续落实定案。根据笔者本人“孙耘（原名孙毓星）”一栏中，“现所在单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加之作为“未定稿”，可推测制表日期在1983年秋至1984年初之间。

笔者认为这份文档是真实存在的，或许最终定稿的文档还有所改动，但基本内容不会改变。本文试以个人的认识对它作一个解读。

#### （一）、陈楚三的信和清华后文革史

首先，我注意到，这份材料的成形时间与陈云对孔丹来信批示的时间——1984年2月27日相近。陈云简短的批示中两次点陈楚三的大名：

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其中，“陈楚三的材料”当指陈给中组部写的一封信〔1〕。

陈楚三，革命先烈陈潭秋之子，清华数力系1960级学生，414派主要头头之一，被称为“温和持重的造反派”。此文档将414派6名总部“核心成员”，包括“未发现什么问题”的陈楚三和孙怒涛，全部列为“记录在案”对象，或许与陈写信一事有关，当然这尚待进一步考证。

实际上，早在1983年春中共中央就明确指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对错误严重的人要进行处理。”〔2〕

恰恰在同一时间，“1983年，在中组部青干局任处长的李志民找到我，希望我写个东西，介绍红卫兵的起源和发展”，陈楚三学长说（参见注1），“我花了大约半个月时间，用稿纸写了一万字左右，以私人信件寄给李志民。”信中“着重叙述了清华大学414派和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派的斗争情况，……（我的）基本观点是，反对把‘红卫兵’视为‘洪水猛兽’，主张对红卫兵也要一分为二。”这里的“一分为二”可有多重涵义，其中包括：红卫兵组织众多，分成各种派别，观点不尽相同，像清华414一类——被孔丹称为造反派中的“策略派”，在文革中抵制极左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

陈楚三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也是正统的观点，例如，“对红卫兵是跟着林彪四人帮‘受骗上当’的说法提出异议。……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受骗上当，那就是受党中央的骗，上党中央的当了”；对文革“不应当简单地‘彻底否定’，而应当认真总结，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相信多数文革亲历者都会承认，这些看法是富含理性、实事求是的。

更为要害的是，陈楚三在信中“特别提出‘八旗子弟’问题”，批评众多“八旗子弟”（今天称“太子党”）在文革初期“紧跟”、“敢于造反”，但后来“父母受冲击、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了，逍遥了，从而“对毛主席党中央产生怀疑”了。与他们相比较，“大批工人、贫下中农和普通干部子弟反而无私无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确实，当年毛泽东就用古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警示坚持“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并引用“触龙说赵太后”里的一句话批评西纠、联动一类贵胄子弟：“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

进而，陈楚三“举贤不避亲”，特意向中组部推荐了清华414派的三位杰出代表：沈如槐、罗征启和任彦申。这又一次触动了当权者敏感的神经：当初蒯大富向工作组夺权，如今陈楚三们向党中央要权。在他们看来，这两派都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眼睛离不开“权”的造反派，没一个好东西。

陈楚三的这封“私人信件”，被时任中组部青干局局长的李锐批给下属处级以上干部传阅。当时青干局里集中了不少“清华牌”的高干子弟，对文革和清华两派各有自己的看法，结果这封信被某一位送到陈云那里。最后，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是，无论是“极左”的井冈山，还是“温和、策略”的414，都作为“造反派”被列入另册。陈云在批示中强调“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在他看来，蒯大富早成了“死

狗”，或已不足为患，而414陈楚三他们同样是文革中的“群众领袖”，还有抵制极左路线的光环，是更具迷惑性和危险性的“野狗”，需要特别警惕，因为“家狗斗不过野狗”。陈楚三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已被“记录在案”，如今再回顾三十年来自身经历的是是非非，许多谜底就昭然若揭了。

这份文档涉及清华的文革史和后文革史，并将两者联系起来，又一次揭示清华在政治上的独特地位——与中央高层政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后文革史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生态紧密相关，亦影响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走向。研究清华、乃至全国的后文革史自有其不同寻常的意义。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资料也很零散。笔者认为，后文革史是全部文革历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引起关注文革和研究文革的人士的足够重视。

## （二）、不能遗忘的历史：清查五一六运动

文档的附表中列出团派“记录在案”人员分十类共76名，其中多数人我都认识或知晓。读到“在该组织中的地位、头衔及其主要问题”栏内的种种描述，有似曾相识之感——它们无疑来自当年的揭发交代材料。

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1968年7月27日工、军宣队进驻清华，制止了百日武斗，全面接管了清华领导权，开始了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新阶段。

团派自百日武斗开始，就走上一条不归路，直至7·27武力对抗工宣队，造成重大伤亡，自此团派与工宣队，特别是领导工宣队的8341军宣队结怨殊深，最终为自己的“头脑膨胀、浑身浮肿”付出代价。

工宣队进校后将两派头头集中到“大联委学习班”，让他们相互揭发、主动交代问题，写过不少大字报和书面材料。到1968年12月，七、八字班和九字班除个别人外都陆续分配离校，蒯大富也分到宁夏304厂。第一轮审查虽草草结束，却积累了不少原始材料。

大量的揭发交代材料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

1967年至1968年，各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文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形势安定后第一项政治任务就是“清理阶级队伍”，以后又依照中央统一部署，连续发动了“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两轮政治运动。这几场接踵而至的运动有一个共同特点：由权力机构——各级党委和革委会组织领导，矛头向下对准不同类型的群众。

“清理阶级队伍”是“新生的红色政权”立威的手段。对平民百姓查三代、翻旧帐，40岁以上人人过筛，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据统计清华校内就有24人自杀身亡，超过工作组时期和百日武斗〔3〕。北大才女林昭在此期间（1968年4月）被处决，家人在被索要5分钱子弹费时才知晓她的噩耗。

随后，1970年1月“一打三反”运动登场，借落实战备之名，重点“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并将杀人权下放到省一级，而且要求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然后召开群众大会，成批宣判、立即执行。据统计，“1970年2月到



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4〕也有研究者认为，杀人数字应达数万，以致毛泽东在1970年底发话：“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纠正捕人杀人过多的偏差。

在这场运动中，一大批思想先驱者死于枪口之下，有北大才子顾文选、沈元；有以“出身论”作者遇罗克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的思想者，像南京的查金华和陈卓然、河北张坤豪、新疆忻元华等；甚至还有江苏常州的老红军蔡铁根大校。“一打三反”开创了公开、成批处决平民政治犯的恶劣先例，实际上罹难者大多都够不上政治犯，至多是有些异端思想和言论的“思想犯”。

派性永远与政治运动紧密相随。许多地方掌权一派借机清算武斗旧账，枪毙了一些失势的对立面头头。我在湖南常德认识一位水运公司“海总”头头郭大副（属于工联一湘江风雷一派），就被处决。1980年在清理复查旧案时获平反。

与此同时，1969年末至1970年初，清查五一六运动率先在国务院一些部口展开。在一片肃杀气氛中，1970年3月27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把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并列在一起，说成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幕后操纵者，还特别指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只有一个‘五一六’。”于是，全国各地那些已经失势的造反派组织（多为激进派）统统被打成“反革命秘密组织‘五一六’”，制造了涉及上千万人的史上最大冤假错案。在北京，蒯大富被指为“五一六”的总头头。

迟群、谢静宜主政的清华从1970年秋开始大张旗鼓地清查“五一六”，虽启动较晚，但气势更猛，有一、二千人受到冲击，一时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逼供信下有人承认“五一六”阴谋组织的存在，而且填了表，后来居然找到制表人和烧表人，井冈山兵团堂而皇之地变身为“五一六阴谋集团”。10月底，以开四届人大准备会的名义将蒯大富骗回北京，后来学校又派出专案小组或发出公函使数百名已离校的学生受到“隔离审查”，其中二、三十名团派的重点分子被揪回学校，包括笔者本人；414方面只知道沈如槐一人回校；六字班分配留校的两派头头都被审查。

1971年初清华的清、批运动达到高潮。2月9日，我在上班时被三位解放军带走，经两天转车到北京，隔离在学校东主楼八区。我的邻居有老团的任传仲、吴慰庭和老四的蒋南峰等。到清华当晚迟群就与我个别谈话，诱导我交待“五一六组织问题”。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我也曾有过动摇，与不少人一样有过轻生念头。我的对门关着一位无线电系女性实验员（其爱人是地质学院“东方红”的骨干分子），曾喝敌敌畏自杀，幸未致命。清查五一六期间校内自杀身亡者有四名，除一位教师在9003大楼恒温室自缢以外，另外三位：栗乃志、陈贯良和老工人韩启明都是团派骨干。近年通过校友网陆续得知，校外还有多位“非正常死亡”的同学（有的尚不确定是否自杀），如“捉鬼队”的李介谦、“不怕鬼”的彭正光等等。此外还有跳泰山舍身崖的荐健、触电身亡的王崇基等同学。这一时期校内校外自杀身亡的师生员工之多为清华历史所仅见。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本来就子虚乌有，当然搞不下去。迟群很聪明，赶紧中止从外地揪人（据说曾计划揪回200余名），转而强调“5·16罪行”。实际上，早在1970年11月周恩来就说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于是，专案组将我在文革中的活动又翻腾一遍，依然找不到什么“5·16罪行”，最后还回

到罗征敷事件上重新定案。1973年5月，历经2年零3个月的审查，我背负着“帽子拿在群众手中”的十字架回到海拉尔。

有414的朋友问我：为什么老团挨了那么多整，在反思文革中，许多人却缄默不语？我只能说：你们没有那样的经历，就很难理解我们的感受。物0王克斌同学以自己的亲历给出坦率的回答（5）：“清查516是我一生最暗无天日的时期，几乎失去了人生的希望与动力。我不是个英雄，在无情的批斗下，我屈服了，我交待了，甚至还想过走上绝路。……伤心的回忆不好写，真的不好写。但我还是咬着牙，忍着泪，把它写下来了。……我还是勇敢地把它贴了出来，不为博得同情，同情已经没有意义，而是让别人了解运动的过程，知道什么叫残酷无情，知道什么叫草菅人命。”

王克斌，团派工物系分部委员，1970年分配留校当“新工人”。他详细记述了自己在清华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袒露自己的所思所想：如何被专政，失去自由；如何“政策攻心”，被迫交待；如何被抄家；如何谋划自杀，又如何因栗乃志跳楼身亡而获得解脱等等，并为冤死的栗乃志同学留下只鳞片爪。人到古稀之年，仍保持这样的勇气、坦诚和责任感，的确格外值得钦佩。

栗乃志是“纳新”不久的党员，时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和清华大学党委委员。他视政治生命重于一切，因而才走上这条不归路。那一晚的情景王克斌历历在目：

“正在我思虑着何时动手（自杀）的时候，大约半夜一点多钟，楼道里传来了大嗓门的武继玉的叫声，‘栗乃志跑了，栗乃志跑了’，整个楼道顿时骚动起来，过了几分钟，传来了栗乃志跳楼自杀的消息……我顿时失去了控制能力，……觉得浑身上下一阵哆嗦痉挛，上牙和下牙不住地嘎嘎碰响，那时节，我说不清是害怕死亡的突然降临，还是痛惜失去了一个要好的朋友，还是因为我差一点死在了栗的前面。相比之下，乃志死得壮烈，我过于犹豫，晚了一步，苟且偷生。乃志人没了，但他的精神还活着，我人活着，可精神上却已经死了。”

后来得知，“乃志在2月中的那天夜里，乘着没人看守，把背包带拴在暖气片上，从二楼窗口顺着绳子溜了出去。马上跑到旁边北京大学的宿舍楼，从5层楼的楼顶，头朝下，栽了下去。……听专案组的华如星说，从日记里发现，乃志在九大后思想一度灰暗，因为他妹妹那时自杀身亡，家里还有孀居的老母。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两个孩子都死了，白发连哭黑发两次，好不凄凄惨惨戚戚。”

时隔40余年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依然无法抑制内心的悲愤。

纵观中共党史，至少从延安整风开始，历次运动都是“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最后再“装袋子”。逼供信下的揭发交待材料尽管多如牛毛，却真真假假鱼目混杂，经不起历史的考验，然而它却可能影响当事人的一生。“逼供信”已成为与政治运动如影随形的一个怪胎，与“冤假错”（案）相伴相生的一对孪生兄妹。一方面，每次运动都三令五申：反对逼供信，比如四清运动时“二十三条”就明确规定：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而另一方面，逼供信又是办案审查中屡试不爽、百用百灵的高招。团派在搞“罗文李饶”专案时用过，主要靠体罚和毒打，制造了一起后果严重的冤假错案；迟谢在清查516时也用过，主要靠威胁利诱和强大的政治压力，而且效力更大，不但材料收获丰富，还逼迫许多人走上“自绝于人民”的不归路。文革后的“揭批查”和“清理三种人”运动，依旧沿袭这样的办案思路和方式方法。今天一次再次地强调“依法治国”，能不能有实质性进步，人们在拭目以待。

1974年，中共中央下文要求“复查”，宣布五一六阴谋集团案是冤假错案，许多单位当着本人面销毁了档案中的所谓“黑材料”。然而，在清华的某个角落，却依然把它视为传家法宝，当作机密文档保存，到“清理三种人”时就拿出来作为其“主要问题”的素材，并加工成描述罪名的简短文字，如附表2“主要问题”一栏的内容。

解读“清理三种人”中的文档资料不能不涉及后文革史。正是这些文字材料将清华后文革史和文革史联系起来。

### （三）、后文革史之一：平反冤假错案和揭批查运动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华国锋与叶剑英、汪东兴等联手采取非常手段抓捕江、张、姚、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宣告文革结束。文革十年，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走向极致，所谓“物极必反”，顺应民意的平反冤假错案（政治上）和改革开放（经济上）成为历史的必然。

随着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及中组部部长，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辩论拉开帷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深入人心的一个论断。于是，文革中受迫害打击的各级干部一律平反昭雪，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在复查文革案件中，“一打三反”时错杀的政治犯和一些派头头也获得平反。进而，平反冤假错案的浪潮波及到文革前的多次政治运动。1978年，右派分子先是全部“摘帽”，后又予以“改正”，按官方公布的数字，涉及55万余人。

紧接着，1979年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家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6〕。从此以后，大家都是社员，没有了“阶级”之分，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被釜底抽薪，中国的现代种姓制度就此寿终正寝。我始终认为，胡耀邦，也只有胡耀邦能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顺势而为，造就了这个划时代的伟大决策，也足以让他名垂青史。同时，数以亿计的大批政治贱民和他们的亲属获得解放，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充分的社会条件。

为巩固新的、以非正常手段获得的政权，从解决“四人帮”开始，就发动了一场“揭批查”运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和清查其帮派体系。1978年4月公开逮捕“五大领袖”标志着揭批查运动达到高潮，几个月之中，全国范围内抓捕四人帮“帮派人物”达数万人。

一般认为（如“百度百科”），“揭批查”运动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终止。实际上，对清查对象的审判和处理一直延续到1982年“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理以后，并接续上下一个政治运动——“清理三种人”。

“揭批查”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是“从‘文革’结束过渡到‘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过渡时期的过渡特点”〔7〕。考查后文革史不能忽视这个“过渡时期的过渡特点”。经过这个过渡阶段，中国才进入美国学者傅高义所说的“邓小平时代”或杨继绳学长所说的邓、陈“双峰政治”时代。

“揭批查”运动的“过渡特点”之一是呈现纷繁复杂的非平衡性，各地区各部门差异甚大。究其原因，一方面上层权力不断转换，汪东兴、吴德、华国锋等相继辞职，邓小平、陈云、胡耀邦接替成为最高领导人，不但政策侧重点有所调整，而且直接涉及省市一级领导层的变动。二来就各省而言，文革十年党内斗争反反复复，各地的历史情况和主要领导人（即运动的决策者）的现状、水平又各不一样，所以“揭批查”运动的走向都不尽相同，目前有关的揭示和研究还很不够。

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的“揭批查”运动亦有相似的特点。第一、以笔者的了解和亲身体会，派性色彩就是最突出的共性。作为文革以后的首个政治运动，揭批查不可能不是文革政治的某种延续，因而带有较强的派性色彩是必然的。这里的“派性”既包括文革中的派别分野，也涉及共产党历史上（包括历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宗派，而这两者往往又相互关联。

第二，尽管“揭批查”没搞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扩大化的倾向还是普遍存在的。

第三，“揭批查”和以前的政治运动一样，都要造势，强调“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开展了‘双打’运动，打击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击了进行反攻倒算的地富反坏分子、刑事犯罪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打砸抢分子”〔8〕。1977年“揭批查”初期就处决了一批犯“恶毒攻击罪”的政治犯，典型如江西李九莲、钟海源案，成为华国锋的一大政治污点。

“揭批查”运动的目的在于清理各个级别的领导班子。所谓“帮派体系”是指各级班子中造反派的代表和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他们作为重点清查对象几乎无一漏网。1987年9月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在《关于“两案”审理工作的总结报告》中点名列出一些“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帮派骨干分子”提请司法机关进行审判，如：“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浙江的翁森鹤，江苏的华林森，福建的陈佳忠，江西的万里浪，湖南的唐忠富，湖北的夏邦银，河南的唐岐山，云南的黄兆琪”等，“同时，全国各地还依法惩办了××××个罪恶严重的打砸抢分子。”〔9〕这里，除四川刘、张属于造反派的干部以外，其余都是工人、学生群众组织的头头，而且多是较为温和的“策略派”头头。

河南是派性清查并导致严重扩大化的典型。原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是1961年“信阳事件”后，临危受命调任河南省着手解决大饥荒问题的。他作风朴实成绩卓著，素来受毛泽东赏识，是文革中最早被“解放”的干部之一，因而带动了一批干部“亮相”到中央文革支持的“二七公社”一派。揭批查运动中，刘建勋被调离，“二七公社”派的干部群众遭到整肃。网上有多篇文章以事实和数字揭示河南的派性清查，如，“处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五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十万六千人，逮捕判刑1700人”；1983年11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中一份书面发言中披露，“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多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止目前（九月份）已处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的2025人（其中开除党籍323人）”；“派性清查在全省有着普遍性。例如确山县，文革期间，两派武斗，双方各自被打死打伤二十余人，但在清查中，只清查了一派，处理了一百多人，其中判刑2人，死刑1人。而另一派一个也没有处理，主要头头、武斗指挥者，反而被提拔为县委负责人”，群众形容河南的揭批查是“一派升天，一派坐监”。〔10〕

请看一个典型事例。被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的张钦礼文革中按照周恩来的表态支持并参加开封“八二四”一派，后被委任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揭批查运动中张钦礼于1978年2月28日被逮捕，1979年12月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张钦礼不服，提出上诉，认为“事实有出入，不应追究

我的刑事责任”。鉴于刚刚发布了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1980年8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一、撤销商丘地区中级法院（79）商法刑字第10号刑事判决书定性部分，改按煽动打砸抢迫害干部的性质定罪。二、维持原判有期徒刑十三年之刑罚，驳回上诉。”变了罪名却不变刑期，张钦礼坐满13年牢房才出狱。

2004年5月17日，河南兰考发生了一件震惊世人的大事——十余万群众跪地哭祭他们的老书记张钦礼魂归兰考。这种场面仅在焦裕禄去世时出现过。平心而论，张钦礼作为文革中最早“解放”最早“结合”的干部肯定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但他罪不当重判。派性主导下的揭批查沿袭历史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流弊，大大加深了干部之间、各派群众之间的裂痕。时至今日，关于张钦礼的争议还没有完结，活着的张钦礼们还在不断申诉。

1982年中央9号文件根据陈云和胡耀邦的批示指出：“两案”中受审查人员的问题，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在这场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除了若干阴谋野心家以外，当时许多人说错话，办错事，或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有一些罪行，都要考虑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对“两案”受审查人员问题的处理，采取“从宽从缓”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两案”定性处理中要留有余地（11）。可以认为，这也是对前一阶段派性清查的纠偏。

后文革“过渡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最高权力的更替。

与揭批查运动同时，最高权力的更替不断进行，到1981年6月27日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最终辞职，权力更替正式完成。全会公报说：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次更替与以往不同，没有“腥风血雨”，是和平交接的。这是中国共产党明显的进步，说明党的领导层，包括华国锋和老一辈的陈云、邓小平等，都从“文革浩劫”中吸取了教训，改进了党的政治生活准则。

#### （四）、后文革史之二：“两案”审判和清理三种人

“揭批查”、“两案”审判和清理三种人首尾相接，构成后文革史几个重大历史事件。“揭批查”的后期处理阶段和“两案”审判相连，像五大领袖等重点对象都是比照两案审判结果判刑的，而紧随其后就是“清理三种人”。

在“揭批查”和最高权力更替基本完成后，1980年9月26日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中发〔1980〕73号文件），开宗明义指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解决敌我矛盾，处理路线错误是解决党内是非。这两个方面，必须明确地、严格地区分开来。决不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牵连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过错、失察等。也就是说，首先划出一个明确的界限，定下基调。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了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江青、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场审判是“双峰政治”主导的。杨继绳这样解析：邓小平和陈云风格不同。邓小平是铁腕人物，而陈云常以中庸取人。对宫廷政变方式处理“四人帮”问题，众人拍手称快，陈云却说，这种方式“下不为例”。审判“四人帮”时，邓小平主张枪毙江青和张春桥，陈云说：“如果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从积极方面看，在中国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双峰政治比一峰政治好。（12）

1982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下发《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参见注11），要求：按照胡耀邦同志和陈云同志阐明的中央对“两案”处理的方针政策和《纪要》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审慎地处理本地区本部门的两案工作。如前文所述，“纪要”强调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场“政治斗争”，处理时要“从宽从缓”，“留有余地”。

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同时宣判。蒯大富不服，提起上诉。同年6月2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刑事终审裁定书》，维持刑期17年的原判。在同一时期，全国各地涉案的造反派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都参照这些典型案例先后判刑。

从政治上说，两案审判标志着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终结。

老资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深谋远虑，在1981年5月宣判四人帮以后就不失时机地提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他在1981年7月2日“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中说：现在问我们这些人，“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讲的绝大多数“红卫兵小将”，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我们都不晓得，只知道聂元梓，只知道蒯大富，但是他们下面的第二把手、第三把手、第四把手，我们不知道。只有什么人知道呢？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的人知道。“保守派”、“逍遥派”也知道那些给我们老干部搞“喷气式”的人。现在提干部，摆到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的一些年轻人，我们不了解。……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的分子，一个也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我说一个也不能。（13）

1982年9月6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大上发言，昭告全党要警惕“三种人”：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14）

陈云三番五次谈及“三种人”，态度坚决，目标明确，就是针对文革中的“造反派”，不管是“极左派”还是孔丹所说的“策略派”，决不能作为“中青年干部”提拔，而“保守派”、“逍遥派”是可以信赖的。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当年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不够积极，被讥讽为“不搞路线斗争，只搞线路斗争”（指打毛衣、焊收音机）的逍遥派，现在看来是最有觉悟、最正确、可以被信用的。无怪陈楚三他们要愤愤不平了。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十年，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都被卷进这个大潮，几乎无一遗漏。那么如何划分“三种人”呢？邓小平进一步作了诠释：“三种人”中间，大多数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年轻人，也有老干部，是少数。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那个时候，不说违心的话行吗？有些事明明自己不赞成，不违心地去行吗？（15）邓小平这些话实事求是，的确反映了那个时代活生生

的现实。然而，对“老干部”可以宽容，对“年轻人”却睚眦必报；对不同群体使用不同的标准，着实令人匪夷所思。人们常批评西方在民主、人权问题上行使双重标准，我们自己在政治生活中为什么也搞双重标准呢？

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作为整党的中心任务正式发起这场运动。

《通知》首先论及当前形势：通过揭批查运动，已经“对‘三种人’进行了初步清理”，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提出，要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解决好各级领导班子中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问题，在成千上万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同时，必须坚决把‘三种人’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必须防止把‘三种人’作为接班人选进领导班子。”

这里明确提出选拔、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从皇权时代到今天，接班人历来是政治生活中的要害问题。当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目的之一就是解决接班人问题；如今也是为了接班人——特别是自己心目中的接班人，而发起一场“清理三种人”的运动。

那么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作为接班人呢？“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都未能免俗，说来说去还是自己的子弟可靠，至少不会“挖我们的祖坟”。

由于历史原因，大量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出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文革初期属于中学“老红卫兵”的一代红色贵族子弟成为接班人不二的选择。所以，在《通知》最后一节着重指出，文革中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作为清查的重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以及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记录在案的问题，要同本人核对，错误严重的要进行处理。与之对应，文件最后还有一句看似简短却画龙点睛的话：虽然犯有错误但当时是未成年的学生，不要再去追究，也不必记录在案。

笔者孤陋寡闻，仅知“记录在案”四字始见于这份文件，却不清楚这一术语是否早已在人事档案中使用。笔者又知，在“记录在案”之上，依据错误严重的程度分列三等“处理”：1、定为“三种人”（或“犯三种人错误”，或直接定为“打砸抢分子”等，名目不统一），是党员的要开除党籍，非党群众要给予较重的行政处分；2、犯有严重错误，要给予党内处分或行政处分，控制使用；3、犯有一般错误，按政策基本不影响使用，但具体执行上情况各异。

四个月后中央再下专文部署对“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的工作（参见注2）。文件进一步明确这项工作由党委组织部统管：“如应该记录在案的学生去向不明，由院校转请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负责查找，查明下落后再转递材料”。“本文件下达后，各院校力争在半年内，将经过核实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党组织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并将记录在案人员名册报送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备案”。显然，本文开始提到的那份文档就是按这些文件要求制作的上报材料。

这个文件又明晰规定：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不搞记录在案，对个别触犯刑律、当时已成年者另作处理。这一次再次地重申显然是不让追究文革初期“红色恐怖”中打砸抢、草菅人命的行为，借以保护当年的西纠、联动等“老红卫兵”。但是，基层干部和广

大群众亲历的苦难刻骨铭心，无法忘记这些打砸抢的始作俑者，纷纷向各级党委上书，直至告御状，要求惩处“老红卫兵”中的打人凶手。

这时，原西纠“司令”孔丹着急了。他大呼：“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原来，“像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贺鹏飞、乔宗淮等，像当年的西纠、联动的头头，很多人因此受到审查，在各个地方，不同岗位的很多人都开始出现问题了。”（16）

孔丹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还是陈云办公室学习小组的成员。于是，1984年2月23日，孔丹给陈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抱怨：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他特别强调：“老红卫兵”的这些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

孔丹说：“‘老红卫兵’和‘三种人’基本是同一代人，现在大多三、四十岁”，所以要“依靠他们和广大的中青年和‘三种人’进行斗争”。实际上，两者岂止是同代人，在文革中本来就是当面锣对面鼓的对手。2月27日，仅仅4天之后陈云就作出批示：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参见注16）

根据批示，198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1984）1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更加具体地规定：“‘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年龄未满十八周岁的学生红卫兵中，有些人由于政治上无知，受‘左’的思想影响或受人指使犯了错误，包括‘破四旧’中群众性打人致死一类的严重问题，后来承认了错误，确有认识，现实表现好的，不作为问题提出。”

网上有文章回忆，就在1984年间，北京市组织人员调查文革之初老红卫兵私设公堂，打人抄家，以及在学校内外打死人的情况，包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案等。正在大伙干得起劲儿的时候，中央下了文件，（老）红卫兵的事不准再查下去，并且要求大家上交调查笔记，由上面统一封存或销毁。

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看到徐懋庸写的一篇故事新编，说的是“三国演义”曹操“忌才杀杨修”一折。曹操年事已高，为选继承人煞费苦心。他本喜欢聪明的小儿子曹植，但曹植书生气太重，难当重任，于是决定传位给长子曹丕。为让曹丕顺利接班，就必须剪除曹植的左膀右臂，其首位就是才子杨修。于是曹操为自家千秋大业宁担“忌才”骂名，借曲解“鸡肋”口令、“造言乱我军心”的罪名将杨修斩首。事后，作为政治家的曹操以一个老父亲的心情和语调说与曹丕：以后可不要难为你的弟弟啊。其后才有曹植七步成诗“煮豆燃豆其”的故事。

我们都读过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徐懋庸的角色是负面的。他当年是“左联”的青年作家，共产党员，周扬的部下，自然与鲁迅的意见相左，解放后就成了右派。历经沧桑富有政治经验的徐老先生洞若观火。当年我读了这篇故事新编，对他借古讽今的行径颇感吃惊。如今见识多了一些，知道政治世家代代相传也是常见的一种社会现象，具有黑格尔意义上的“合理性”，因而就更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行为和苦衷了。



时间过去了三分之一个世纪，历经两届过度以后，当年的“老红卫兵”终于接了班。令老一辈想不到的是，他们接手了一个壮大百倍的中国，然而又是一个积弊成山的中国。“老红卫兵”们历经文革的疯狂与磨难、上山下乡的艰辛和改革开放的春风得意，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不仅要感谢陈云运筹帷幄、煞费苦心的安排，也要感谢毛泽东上山下乡带给他们的磨难和接触底层的机会，更要感谢邓小平改革开放给他们提供大展拳脚的新天地。他们将怎样面对机会与危机并存的中国，他们将把中国引向何方，人们在观望，也在期待。

#### （五）、历史的见证：“清理三种人”运动在清华

北京市的清理三种人运动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况？有一份1984年6月30日的《中共北京市委对全市清理“三种人”进展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17），经过“摸底”描绘出这样的一个轮廓：根据各单位报来的摸底统计数字，截止今年五月底，需要调查了解的有一万二千七百七十六人，其中党员一万零七百一十人，占全市党员总数六十八万人的百分之一点六，还有党外人员二千零六十六人。……摸底中查出全市非正常死亡九千八百三十人，已查清四千四百四十二人，占百分之四十五。……到目前为止，在已基本查清的五千五百一十三人中，列为核查对象的九百零一人（核查对象是指问题严重的人），其中已定“三种人”八人，拟定“三种人”的八十一人；拟定严重错误的八百一十二人。

关于北京高等院校（其中有40所中央和北京市“双管”的院校，包括清华在内）的运动进展情况：从一九八三年一月至今年年初，全市各高等院校认真贯彻执行了中组发（1983）6号文件，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影响较大，时间较长的校一级学生造反组织核心成员和有严重问题的人，进行了“记录在案”的工作，现已基本结束。共记录在案的八百五十一人，占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间在校学生总数八万七千六百九十五人的百分之零点九七，目前已经转递出了材料……

对这段话要做些解析。“记录在案”的“基本结束”意味着要记录的人员已确定，并向其工作单位“转递”了材料，但并不是“清理三种人”运动的结束。材料到达各人的单位以后，落实定案还要花费很多时间，好几位同学都是到1986年前后才最终结案的。

这里给出的一组数字很值得思量。清华当时有一万多名学生，以平均比例0.97%计，就该有100名“记录在案”者，超出此文挡上报的人数一倍之多。而清华属于文革的特重灾区，记录在案的比例必然远远超出平均值，人数应以几百计。当年哈工大管理学院罗家骧书记到清华外调时获知一个信息：清华向外发函涉及三、四百人之多，大多要求定“严重错误”以上的罪名，算来要占学生总数的3—4%，能与前述北京市委给出的比例相呼应，应当是可信的。实际上，文档结尾有一句暗藏玄机的话：根据中央有关清理“三种”人的精神，我们正在对“文革”期间的问题作进一步深入清理。“进一步深入清理”的结果就是发函寄材料的达数百人。

我知道很多没有列在表中的同学在“清理三种人”中被审查，耽误了公派出国作“访问学者”的机会。其中多数单位在调查核实后，否定了关键性的不实之词，只按“一般错误”定性，使他们的出国进修推迟了一两年。

究竟清华校方“递转”出多少封信函？这份文档的“完成稿”究竟是什么样？清华学生和教职员中到底定了多少“三种人”，多少“严重错误”，多少“记录在案”？我深信，将来某一天会披露出真实数字，那必是一组令人吃惊的数字，而且它将与当年打右派的数字一样，被钉在清华的耻辱柱上。

前文提到，附表中“主要问题”的来源有二：工宣队刚进校时“大联委学习班”上的大小字报和“清查五一六”时的揭发交代材料。

就前者而言，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当年的大字报五花八门，哗众取宠有之，添油加醋有之，道听途说有之。团派因抵抗工宣队造成重大伤亡，犯下严重错误，头头们在“大联委学习班”上倍感压力。有些人急于表现自己，就一再放高调贴大字报、写材料，甚至给自己上纲到“反毛泽东思想”的高度。

后者，“清查五一六”时的揭发交代则完全是逼供信下的产物。工宣队总让你“竹筒倒豆子”，但竹筒犹如魔桶，豆子永远倒不干净。如果讲到一次总部开会，除落实时间地点参加人员以外，就是不断追问谁都说了什么，直到你白纸黑字写出每个人的“发言”。我没有笔记本作参考（已上交或抄走），更没有超强的记忆力，在巨大的压力下，只好按照“推论”编造这类发言。这是我至今感到很内疚的事。

1985年我接待长春一汽调查陈继芳同学的专案人员，他们拿出清查5·16时我的交待材料，要我重抄一遍作证言。我控制不住愤怒情绪大吵一架，随即挥笔一气呵成写下一份证言：

看到这些清查5·16时的所谓材料，我十分震惊和气愤。在迟群操控下，清华的清查5·16运动波及数千名师生员工，有四人自杀身亡，是不折不扣的冤假错案。中央早已定性并明令销毁相关材料。鉴此，我郑重声明：这些材料完全是逼供信的产物，我一概不承认。除了对材料中所涉及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歉意以外，谁使用这些材料谁就要负政治责任。写完后我签上字就摔门而去，情急之下竟然忘记抄一份底稿，但其内容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18）。

客观地说，上述两种情况下获得的材料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宏观上看，可能确有其事（胡编乱造的除外），另一方面，微观看又大相径庭，因为具体情节里真真假假，往往关键性的情节恰是逼供信的产物，并不可靠。至于由另一派提供的揭发检举材料，派性传闻居多，其真实性就更可质疑了。

文革中我搞过逼供信，整过人；后来又多次成为逼供信的对象，被别人整。我深知，靠逼供信得到的揭发交代材料再“好”再精彩也具有这样的两重性，是不足凭信的，尤其不能作为定案材料。那么如何对待浩如烟海的这类材料？关键在于审慎的复核。上述北京市的文件就专门写道：怎样才能防止扩大化？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调查研究，反复核实问题的情节，根据确凿的事实，认定问题的性质。在写结论材料时要留有余地。要与本人认真核对事实，耐心地听取和分析被核查人的交待和说明。要兼听，防止偏听偏信，防止派性因素的干扰。这些规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未加“反复核实问题的情节”，而直接使用这类材料定案，即使不是别有用心，也是极不负责任的，其结果必会制造新的冤假错案。

回顾历次政治运动，运动后期或运动过后要求复查核实几乎成为惯例。1974年要求对清查五一六运动复查，粉碎四人帮后又要求对文革中的所有案子复查。但是否真正复查了？实际效果怎样？都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有所不同。清华在1979年曾宣称文革案子都复查过了。但据我的了解，由于派性的干扰，其实并没有、或没有真正去复查，更没有“与本人认真核对事实”，比如对陶德坚老师，比如对我认识的许多同学老师，都没见校方向本人或知情者核实问题，更谈不上给他们落实政策了。

许多例证表明清华送出的材料掺杂很多水分，经不起推敲。各单位在收到清华来函后，都要进一步调查核实，以肯定真实内容，否定不实之词。其中很多单位（甚至是多数单位）都否定了清华过高的定性（“三种人”，“严重错误”），仅给予较低的“一般错误”结论。这里须说明，因为该项工作由省市组织部门统管，基层单位无权否定原学校的基本意见，总要给定一个“某某错误”。

我是“清理三种人”的当事人，“记录在案”的对象。我的亲历和这份文档都说明，当年在母校清华，传统的阶级斗争理念、非黑即白的是非观、浓重的派性还统治着许多人的头脑，而这些人从上到下，一直掌握着清华的实权。这样的传统使我进一步质疑清华文革前17年的思想教育和政治生态环境。

还要指出，很多学校的政治生态与清华差异很大。我在哈工大任教时亲见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学生，确实更负责任，也更人性化，绝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报复心。哈工大管理学院的罗书记对清华颇不以为然，他就说：哪儿有这么多“严重错误”？

走笔至此，游历了30多年前那段后文革史，回头再看，心绪已淡然许多。你不能不承认，经历了文革劫难和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党和人民都成熟了许多。在上述关于“清理三种人”和“记录在案”的几份文件中都不止一次强调：“清理工作不搞运动”，“防止派性干扰”，“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要与本人认真核对事实”，等等等等，然而传统的政治惯性往往让这些重要的规定流于形式和说词。

总之，手头这份文档，不论是清华执笔，还是由清华提供全部素材，都是一篇难得的历史见证，从某一侧面忠实记录了这段历史，值得人们细细品味，启发人们去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未完待续）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史海钩沉】

在文革五十周年反思研讨会上的两次发言

• 郑 义 •

5月13、14两日，魏京生基金会在华盛顿D. C. 召开了“文革50周年反思研讨会”。会上我作了两个发言，合并起来，稍加整理，权作我纪念文革50周年的一点意见。在会上，我环顾左右，发现自己竟然成为会议上年岁最大者，真是感慨不已。“回顾某事50周年”这句话不那么容易说——人的寿数有限。能清醒地回顾50年前发生的文革更不容易：岁数太小的当年不明世事，太大的现在已经老去，而当年被束缚在“单位”里，对全局不甚了然。而我，当年刚刚高中毕业，文革中历见丰富，又恰是19、20、21岁。（有人插话：到底是多少岁？众哄堂大笑。我解释道：我所谓的文革，即与中共历次运动有明显差别的文革，仅仅是两年多，跨三个年头。）我还能回顾文革60周年吗？最好不作此想，把现在想明白的话赶紧说了，尽到一个亲历者的责任。

两天的会议，最大心得是：许多围绕文革的争议，一是缺乏对历史的描述性了解，论者多囿于个人境遇；二是同一词汇，各有所指，其实是名实之辩。我下面整理的发言，尽可能列举事实，少作阐发。

◇ 独立工会运动的先驱——“全红总”

八九民运失败后，我挑着木匠工具箱、背着破被卷走向民间，流浪并秘密写作。这对我不算太难，本来就是从乡村、矿山走出来的。于当年底完成一部自传《历史的一部分》。写的都是真话，是可以作为遗言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或迟至一九六七年初，北京出现了一个工人组织：“全红总”。它的全称记不清了，大约是“全国红色造反总团”。这个依托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一开始就毫不含糊地代表工人阶级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表现出一种独立意识。虽然这些要求多为经济要求，但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政治要求的先声。当这个组织刚刚开始展开全国性活动，共产党最高当局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宣布“全红总”为“反动组织”，逮捕了它的领袖，取缔了它的组织。这大约是文革之中钦定的第一个“反动组织”。（目前我手头没有任何数据可供查阅，在核实之前，“大约”二字暂时保留。）当时群众组织林立，共产党为何偏偏视“全红总”为洪水猛兽而大下杀手呢？——事隔多年，我才理解：这是由于这个工人组织一开始就脱离了共产党“群众斗争为上层政治斗争（权力斗争）所用”的轨道，而表现出反压迫、反剥削、争自由的独立自主倾向。

逃亡到美国后，了解到“全红总”历史，证实了我当年的观察和估计。需要纠正的是，“全红总”占领、取代了全国总工会，而不是“依托于全国总工会”，全称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魏京生插话：我知道，是全国总工会里的造反派搞的。我答话：发起者不是总工会的。“全红总”46名常委，绝大多数是外省工人。）

“全红总”成立于1966年11月初，不到一个月发展到18个省级分团。是一个完全全的全国性的自发的工人组织。其宗旨是改革合同工临时工制度。成立后一个多月，召集北京分团5万多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然后包围、进驻劳动部。其浩大声势惊动了中共上层，第二天（12月26日）晚，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紧急接见，想了解并加以控制。在这个接见会上，“全红总”的代表们愤怒控诉：现行临时合同工制度，把几千万工人的政治权利完全剥夺了。他们所列举的十七年来工人们受压迫、受剥削、受歧视的大量事例，使这些中共大员受到震动，有些人大会堂的招待员被感动得痛哭。

再一日，12月27日进驻全国总工会，完全取代了官办工会，直到被镇压。

这个迅速崛起的工人组织有何进一步设想呢？——预定在运动后期（当时一般估计为1967年底）将“全红总”办为独立于官方工会的常设工会，暂定名为“全国劳动者联合会”。最乐观的计划是1967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坏的设想是，如一旦遭到公开镇压即转入地下，在云、贵、川三省择地建立基地。

中共高层迅速警觉。元月19日，周恩来办公室电话通知，称周不允许有全国性组织，并声色俱厉地下达指示：“地方组织可以夺地方上的权，你们全国性的组织是不是要夺中央的权？中央拟在最近就要下达撤销全国性组织的文件，希望你们自己主动撤销，带头遵守中央的指示。”

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工人们拒不服从，三天后，“全红总”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示威。主要口号有：“要革命，要造反，要吃饭，要生产！”“誓死砸碎一切剥削制度！”“全红总是革命群众组织！”

游行示威之后，“全红总”的总部委员召开紧急会议，看清楚摆在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主动撤掉组织，逃回家乡寻求安全，但难保当局不会秋后算账。二是硬顶下去，就要作好坐牢杀头的准备。这样干一下，就是失败了，也可以唤起广大工人的觉醒。何去何从，无记名投票，表决结果：56比1。出席会议的56名总部委员中55名选择坚持下去，选择撤销解散的仅有1人。

最后的结局：全国各地各级“全红总”负责人大都被捕。总部工人领袖分别被判刑20年（灵魂人物贵州青年工人方圆）、两人15年、10年、两人7年、一人5年。

半个世纪过去，再来谈全红总，我们很难指斥他们是“奉旨造反”、“跪着造反”，不是纯粹的民主运动。我们也很难说他们不是独立工会运动的先驱：“全红总”被镇压13年之后，1980年，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非共产党控制的自由工会——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再经过为时不短的9年斗争，推动实现半自由的选举，结束了波兰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个选举日恰好是中国新一轮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的日子：1989年6月4日。

◇ 河南大造反派党言川

“全红总”主要领袖、贵州临时工方圆扯旗造反时年仅18岁。河南大造反派党言川二十出头，比方圆稍大，但扯旗造反要比“全红总”早3个月，在《红旗》杂志10月社论之前。早这3个月，就更与“跪着造反”少了干系。1966年8月是什么日子？那是“红色恐怖万岁”的“红八月”！正当北京在权贵红卫兵制造的大屠杀大恐怖中颤栗时，河南省却冒出一个震动全省的平民造反派组织——“郑大联委”。它的灵魂人物，是郑州大学中文系学生党言川。同“全红总”一样，这个学生组织，也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崛起。刚成立13天，1966年9月3日，便发出一份《火急呼吁书》，称：“多少年来，河南省搞的很不象样子……尤其是在1958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心有灵犀一点通。河南人无须猜测，就明晰所谓“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即“信阳事件”等惨绝人寰的大规模饿死人惨案。

第二天，9月4日，便成立“专揪吴芝圃战斗队”，派人专程去广州捉拿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大饥荒制造者吴芝圃。再一日，9月5日，“郑大联委”策划组织了“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参加者有来自全省各大城市的5万多人。在这个大规模自由集会上，党言川和他的造反派战友们毫不含糊地开始追究饿死三分之一百姓的“信阳事件”。党言川、“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大饥谨罪行，大获人心。也正因此，河南造反派迅速壮大，从少数派变成了多数派，并奠定了河南文革的主轴。有人说，文革时期的中国人整个是疯的，“造反”二字之前，就必须加上一个限制词，叫“奉旨”造反。什么造反派，不就是毛泽东的一群狗吗！真是这样吗？请看一看河南。在1966年8月那种红色恐怖的时刻，河南人民借着“造反有理”的圣旨，趁机造反了！他们清算吴芝圃们，而吴芝圃们背后站的是毛泽东。他们当然就不会有好下场了。几个月后，军队介入，扶植保共派，摧垮造反派，党言川锒铛入狱。军方铁腕镇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变成了“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简而言之，当时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的“文革罪”犯约占半数以上。

发言时间有限，党言川的故事不能多谈了。10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比较详细，题目是《大造反派党言川——纪念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见本刊zk0812c——编注）信阳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地，也是饿死人最多的地区之一。1960年底，李先念和陶铸率工作组到信阳调查，五个月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河南全省饿死人的情况也来不及细谈了。简略地说，比如1959年，河南全省粮食产量只有281亿斤，吴芝圃们竟上报为702亿斤。这颗“卫星”一升天，河南人就只有下地狱！两个数字往那儿一摆，饿死几百万黎民百姓的惨剧已势难挽回。作家白桦是河南人氏，后来回老家息县一带作了些初步调查：息县639个村庄死绝。邻近的固始县，400个村庄死绝。

什么是文革？什么是文革前17年？这基本上是由掌握话语权的人们所塑型的。首先是控制一切思想言论的“党”，以及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干部（中共官吏），还有惨遭迫害的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在他们眼中，文革确实应该“彻底否定”。此乃经历所造成，可以理解。我的经历复杂一些，除了遭受凌辱、毒打，还鼓起勇气反了一反。除北京，我还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四川、贵州、广西文革，比蹲监狱、住牛棚的人多了一点见识。上帝让我当年经见如许，就是要让我将来作证，特别是为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那些死去的和卑微的人作证。青年时代，我曾有10年岁月是同农民、工人、流浪汉每日厮混在一起的。这奠定了我终身的感情倾向。我不是民粹主义者，不喜欢农民起义，只是想为他们也说几句话。

据我观察与思考，文革的核心问题、起因或枢纽，泰半在于“大跃进”时期的人为大饥馑。共产党上层的分裂、毛刘之间的权争、民众对共产党的仇恨，就是活活饿死了这几千万人。在我所到省份，在激烈的文革争斗后面，都可以看到大饥荒的悲惨背景，几乎无一例外。

要讲的话很多，今天的时间不够了，谢谢黄慈平主席给我宽限！

（魏京生插话：今儿下午时间宽裕，你接着说。）

◇ 全国公安大跃进

于是我多讲了几句——

1958年1月1日，毛公开提出“大跃进”。大家都知道这个“大跃进”，但相信太多的人不知道“公安大跃进”。同样在1958年初，公安部闻风而动，立即制定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上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的‘四无’农业合作社和无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这一迅速实现“人间天国”的宏伟计划，毛亲自审阅后下发。实际上，这是要动用专政工具来保卫“大跃进”顺利实行。已经是“夜不闭户”“海内升平”了，地方公安部门还觉得不够，甚至提出了“玻璃板”、“水晶石”的口号：要把整个社会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样一尘不染、晶莹透明。有老公安说，这么搞，不要说没有任何犯罪，就是夫妻吵架、婆媳拌嘴都不会有。

为实现共产主义天国，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定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针。“大跃进”嘛！上级将捕人指针下达到下级，下级再层层加码，捕人指针越来越高。抓了多少人？大跃进期间（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时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建政以来（1949年到1957年）八年之总和。

以安徽省为例：全省1957年逮捕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针是4.5万人，不料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1万人。大跃进三年间，共逮捕17.3万人。被捕者大多是发牢骚、偷青吃青、瞒产私分、挨饿逃荒。这17.3万被捕者中，有5万多人死在关押场所，达总数的将近1/3。

这种政治性突击抓捕，完全无视任何法律程序。很多被捕、判刑的人，没有犯罪事实，有的连档案都没有，甚至连姓名都没有。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没有出过庭，没有和法官见过面，稀里糊涂被送到劳改农场。由于没有档案，成了劳改农场黑人黑户。青海省的浩门农场，就有800多个黑人黑户劳改犯，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些人由东南沿海地区送来劳改，不知道每个人判了多少年刑期，他们统统成了无期徒刑犯人，死了也无法通知家属。（这800个人全部死绝了，我在《历史的一部分》中写过。）

被关押的人，遭受刑讯逼供和长期饥饿，造成大量死亡，而当政者却无动于衷。以青海省民和县为例，3年中死于县看守所、拘留所的就729人。1960年8月，公安部长谢富治来视察，亲眼目睹从看守所往外抬死人，一询问，知道看守所天天都死人，忽然良心发现，对公安局长说：看守所天天死人，你也不采取措施制止，不怕夜里鬼来找你麻烦吗？！谢富治已经够左的了，他也受不了了。谢又嘱咐陪同视察的公安厅厅长杨某：今年青海省计划捕人指针要和去年（1959年）大体持平，不得超过。谢富治去新疆视察返回来，路过兰州，又把杨某叫去，说今年青海省捕人指针一定要控制在中央下达的5000人之内，要超过，必须报中央批准。杨某立即向省委书记高某汇报，高某主持省常委会，认为“今年是誓死保卫大跃进，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关键年，捕人不能少。”于是决定全年捕人指针15000人。报告打上去，中央和谢富治都没有表态，结果全年逮捕了18000多人，是中央5000人指针的3倍多。

◇ 几个匪夷所思的小故事

讲完公安大跃进，众皆沉默不语。我趁机又讲了几个小故事——

故事一：湄潭县关死饥民事件

贵州湄潭县我去过，出美女，地灵人杰。1959年9月17日（中秋节），遵义地委要在这里召开全专区各县“捉鬼拿粮”现场会（即反瞒产私分现场会）。届时地委书记、专员要来，湄潭县委和绥阳公社为了面子上好看，将滞留镇里的游民，从农村来的饥民、饿汉，到餐馆、居民家讨饭要饭、“抓拿抢吃的人”，进行了多次清理、遣送。但不够彻底，到9月16日（开会前一天）傍晚还抓到48人。绥阳公社党委某书记，让将这48人暂时扣押在公社供销社一间仓库里，其中一个瘦个子半夜从仓库门的铰链缝里挤出来逃掉了，还剩下47人。现场会开了两天，自然是很成功。半个月后，这位公社党委书记这才想起被关押的人，打开仓库门一看，47人全死在里面。这一事件震动湄潭，也震动了遵义地委，但消息被严密封锁了。

文革中我到过贵州，有过一些惊心动魄的经历。清华井冈山（激进造反派）驻贵州联络站有几个人在遵义，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当地造反派要造的反就是饿死人，同学们为他们出谋划策，一起调查整理材料。造反派被镇压时，派一辆大卡车装上大桶汽油，把同学们和秘密整理的大饥荒材料一直送出省界。大跃进期间，遵义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当年的贵州省粮食厅厅长王民三写道：我亲自计算死亡人数时“大吃一惊，因为一九五七年末人数是三百七十九万人。两年人口不增反减七十万！”如此算来，遵义地区饿死人当超过百万。

故事二：两个救命生产队长

1960年4月，青海互助县红崖子沟公石郎大队窝子生产队马某就任生产队长。他的70多岁的老妈妈对他说：你当生产队长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救人，不然全队的人都饿死了，你给谁当队长？当时全队村150多人已经饿死40多人。马队长冒着风险，将生产队仅有的4400斤粮食偷偷分给社员，还把生产队4只羊换了800斤蔬菜分给社员。他知道就这点粮食、蔬菜远远不够，遂带领社员上山挖野菜，饿死人状况暂时停止。可他的这些“不法”行为很快被上级发现，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名将他逮捕，被法院判刑5年。丹麻公社丹麻大队红山生产队队长戚某，见全队117人饿死51人，怕全村饿死，带领尚能走动的7个社员，趁夜偷了大队几百斤青稞。来不及磨成粉，连夜煮熟，挨家挨户送到各户。天还没亮，被大队干部发现，报告了公安局。警察来抓他，没有饿死还能动弹的村民为他送行。求告说：我们生产队100多人，现在只剩下50来人，要不是戚队长给我们分点粮食，恐怕都饿死了。公安同志，我们只要求一件事，你们不能虐待他，不能把他整死，我们还等他回来救我们呢！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将戚队长带到县城集训队。一个月后，戚元法死在集训队。最后，这个生产队最后只有18个人没有饿死，幸存下来。

故事三：偷割驴耳朵的少年犯

青海省湟中县被誉为“青海的粮仓”，也是饿死人最多的县。1960年春，湟中县汉东公社元山生产队每人每天口粮只有2两（16两1斤），比四川宜宾农民向我控诉的每日3两7钱5还要少。14岁的学生李占祥，全家11口饿死7口，就跑到大队饲养场，偷了两只小羊羔，回家维持了五天。怕全家死绝，又拿上镰刀、绳子，再次跑到饲养场。乘饲养员不在，将一头毛驴的腿和脖子捆上，割了一只驴耳朵。饲养员和大队干部顺着滴血，找到李家，他正在刮驴耳朵上面的毛，又搜出两张羊羔皮，人赃俱获。大队干部将他捆上，在他耳朵上穿个洞，挂了割下的驴耳朵，送到公安局。公安局长表扬了这位大队干部，以“杀害牲畜罪”将李某逮捕，判处10年徒刑。后来，省委工作组到湟中县检查，问为什么李占祥还不释放？局长说，李占祥偷大队羊羔、割驴耳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当时的省委书记王昭听汇报后说：李占祥家11人饿死7，他为了活命不得已才那样做，再说他还是个孩子，按法律规定也不应该逮捕呀！这样，李占祥才被释放回家。回家后知道全家人除他外全饿死了。监狱倒是救他一命。于是带着几件破衣服，到新疆去找他叔叔去了。

文革前十七年，可谓暗无天日！

有了机会，为什么不趁机造反？

◇ 几句结语

有人对文革时期的“四大”甚为不屑，认为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是假民主假自由。完全正确。对这种高论，我是竭诚拥护的。但是，无论在1966还是2016的中国，在这种令人窒息的高压社会，能说一句话，总比勒住喉咙要好。当年的老百姓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总比“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要好。当然，假如历史给予我们可能，一开始就举起“结束中共一党暴政”的旗帜，那就更好。我所谓“两个文革”、“人民文革”的提法，不过是提请注意文革中人民反抗暴政之因素，不可跟在人家屁股后鹦鹉学舌式地“彻底否定”。控诉“造反派”暴行我也竭诚拥护，但请不要虚指，最好附上那个“造反派”的组织名称。这样一来，人们一查，多半会发现那原是“老红卫兵”或“保守派”，可作会心一笑。说白了，用最极端的话来讲，各地大杀“地富反坏右”的，不都是“老红卫兵”和“保守派”吗？时至今日，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等一切“阶级敌人”早

都“一风吹”了，唯独“造反派”、“三种人”还在另册上从未“平反”，绝不“平反”。那是因为，五十年前，在短短数十天、几个月、至多一两年时间里，他们戳到了中共统治集团要害，把他们戳痛了。

统治者的报复已然足够，我们为何还要把他们踩在脚下继续践踏！

2016年5月16日整理于维吉尼亚

□ 原载：《纵览中国》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